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出版）

---

本期目录

---

【追根溯源】	文革的制度起源：压制不同声音和“大跃进”	许成钢
【研究评论】	平民之殇——关于纪录片《罪行摘要》	老 许
【人物春秋】	海燕与太阳——张春桥心路轨迹试探（二）	萧 木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

【追根溯源】

文革的制度起源：压制不同声音和“大跃进”

· 许成钢 ·

至今，“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过去半个世纪了。这是由时任主席，“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泽东发动领导（林彪，1966），由所有中共党政官员和亿万人民参与的。

半个世纪前的今天，中央政府的多数部委，各省的多数厅局，都丧失了基本功能（中国超过百分之九十的国有资产实际早就由各级地方政府控制；所有集体资产从来由地方政府控制）。其中一些中央部委被永久性解散。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和鼓励下，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从政府到企业（以及农村人民公社），到处的党政军民，都在为争夺权力而斗争。毛泽东在1967年视察大江南北的谈话中宣称，当时是“形势大好。形势大好的标记是天下大乱”。时任副主席、“副统帅”的林彪清楚地陈述了文革的重要目的：把权力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回来。他说，“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了政权就丧失了一切”（林彪，1966）。为了夺取政权，从而控制“一切”，所有党政军民中的派系，在城市、农村与对立派争夺、厮杀，有些地区甚至动用了重武器。而每一派都以忠于毛主席为理由去攻打对手。

直到1969年，在借助军队平息秩序，保证中央对地方的严格控制后，中国巩固、强化了，自从“大跃进”以来建立的，政治上高度集权，行政经济上高度分权的，向地方分权的极权主义制度（分权式极权制）。自从1950年代初以来，在中国全盘苏化，建立极权制之后，“大跃进”是系统性地偏离苏式极权制的第一个重大制度变革。这是产生文化革命的制度基础的重要部分。在相当程度上，也是文革的前奏。它造成的影响极其深刻，一直影响到今天的中国。

中国今天的分权式威权制，其部分重要制度基础源自“大跃进”。“大跃进”是全国全面推行地区竞争机制的发源，而人民公社则既是全国全面推行地区实验机制的发端，也是全面推行地区实验机制的结果。即，中国改革以来曾经行之有效的地区竞争和地区实验的机

制，从某种意义上说，源于“大跃进”。在文革研究的大量文献中，普遍把毛泽东和刘少奇对“大跃进”的不同见解，或因此引发的权力斗争，作为导致文革的诱因。但忽略了“大跃进”引起的巨大制度变化，没有看到“大跃进”为文革奠定了制度基础。

#### ◇ “大跃进”运动作为改变制度的一场“革命”

在1950年到1956年期间，中国已经建立了典型的极权制。但苏式的典型极权制的权力分配在中共内部引起矛盾。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用枪杆子建立全国政权之前，是以地区为单位统治各个相对独立的“解放区”的。各个“解放区”的力量合成在一起，以类似联邦制的形式，构成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基础，是中国共产党权力的基础。在1950年到1955年期间，在全国全面迅速地建立了苏联式的极权制，包括政治经济组织的具体形式。在这个制度中，中央把原本属于地方的权利都拿走，既引起地方官员的不满，也破坏了他们的激励机制。毛泽东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反映了全盘复制苏联式的极权制和中共传统的地方权力权利之间的矛盾；反映了在1956年期间，中国共产党内部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争论。

“大跃进”是第一次把中国从典型极权制变成向地方分权的极权制的第一次“革命”。这次革命的主要制度变化，是向地方政府大规模放权，包括行政权和经济权。这种在保持中央对地方的政治和人事紧密控制的基础上，大规模向地方放权的制度变化，从基本上破坏了苏联式计划经济的基础。其实质是在具体统治方面，部分恢复中国帝制的传统制度“郡县制”。1958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描述自己和他领导的中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从制度角度，他所谓的马克思，指的是从苏联来的典型极权制，包括共产党制度。他所谓的秦始皇，指的是郡县制。

毛泽东之所以要推动这场向地方放权的革命，有两个重要的动力。第一是最高领袖的权力。向地方分权有助于巩固中央最高领袖的权力。因为在1950年代初大规模集权之后，地方已经没有可以与中央竞争的政治领袖。但中央不同。中央政府各部委的行政、经济力量越强大，中央部委实际上可以制衡最高领袖的实权就越大。大规模分权会极大地削弱中央部委的力量，实际加强最高领导的政治权力。第二个原因是出自统治全国政治经济的具体考虑。毛泽东熟读《资治通鉴》《史记》等等古书。

在“大跃进”初步建立的分权式极权制中，一面是是对人事、政治路线、经济路线和意识形态的高度集权，程度比苏联还高。另一面是对行政和经济的大规模的放权。88%的中央各部所属的企业被下放到地方各级政府。这个制度导致了党内外和政府内外原来就已经非常微弱的制衡机制被进一步大幅度削弱。此前中国的极权制中，制衡的力量已经非常之弱。但有从苏联学来的一套统计、监察、计划、执行等在技术层面互相制衡的部门和制度。如果有机构作假，另外的机构能起制衡作用，避免作假。“大跃进”向地方放权，把这一套制衡机制全部破坏。在苏联式的制度中，虽然不能很好解决激励机制问题，但是至少可以预防最坏的作假问题。把这些微弱的制衡机制也破坏了，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在所谓的浮夸风、“放卫星”等机制盛行之下，多省爆发空前规模的大饥荒，导致几千万人饥饿致死。

#### ◇ “大跃进”及产生大饥荒的制度条件

“大跃进”在中外历史上最著名的不是其制度变化，而是其导致的巨大灾难。压制中共党内外不同意见，是导致“大跃进”灾难的重要原因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曾严谨地论证，20世纪以来，由于农业、运输和信息通讯等领域的巨大进步，全世界上已经完全消灭了纯粹自然原因造成的饥荒。即，任何饿死人的饥荒都是人为因素造成

的，包括封锁信息。他研究的案例中包括中国“大跃进”时期的大饥荒。他指出这是人造的饥荒。而这个人造饥荒的核心就是极权主义制度，压制、破坏了其内部的所有的制衡力量，破坏了信息传递的渠道。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其前奏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在那场运动中，把向中共提出批评意见，或表达不同声音的所有党员非党员的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都打成右派，即中共的敌人。据改革开放早期的官方统计，全国受到各种打击和惩罚的右派分子数字高达五十几万（最近有证据表明这一数字是三百多万）。经历如此全面彻底的打击之后，党内党外，甚至包括中共的高级领导人，都没人再敢发出与最高领袖不同的声音。这为创造盲从的群众基础和巩固极权制度准备了条件。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和鼓吹随之升级。

饿毙几千万人的大饥荒的直接原因是虚假信息 and 隐瞒信息。任何统治者都希望避免饥荒，包括专制制度的统治者。问题是，在“大跃进”时期，为什么最高决策者不能发现虚假信息的问题呢？问题在极权制度。当制衡最高决策者的机制被完全消灭，个人崇拜盛行时，质疑虚假信息的机制不复存在，即使有人内心质疑也不敢说出来。

例如，在1958年，周恩来对“大跃进”的谨慎被批判为保守，并被迫做公开检讨。他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职务被取消。随后分管计划经济的副总理陈云、李先念和薄一波都为表达对“大跃进”的不同意见作检讨。所有的中央政权里面主管经济的人一律低头认错。同时，而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在此背景下，刘少奇和林彪积极支持“大跃进”，批判周恩来、支持柯庆施。（虽然几年之后刘试图扭转饿毙几千万人的大饥荒的大跃进，而这是他在文革中被打倒的主要原因之一。）随后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柯庆升为政治局委员，林彪升为政治局常委。而柯庆施则提拔重用了张春桥（文革中的“四人帮”一员）。

政治的极度集权完全破坏了中共党政高层的监督和制衡机制，剩下的唯一的激励机制就是“胡萝卜加大棒”，即奖励和惩罚。但是，在没有制衡和监督机制下，真假不分，变成谁吹牛就给谁奖励，即提拔。在严重扭曲的政治环境下，甚至一些最著名的学者也在参与了宣传鼓动。

例如，《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媒体6月发表钱学森的文章，从光合作用固碳的角度计算和论证，一亩地可以产10万斤以上的粮食。为“大跃进”中各地的亩产吹牛竞赛奠定了“科学基础”。“大跃进”时期最出名的，因吹牛被提拔的一例，是河南省省长吴芝圃。他被毛泽东称为“大跃进的先进典型”。而河南省正是“大跃进”时期大饥荒饿死人数最多的省份。恰是因为河南省吹牛吹得最狠，而中央就是根据各省报上来的粮食生产数量向各省收缴粮食。因此“大跃进”时期大量的粮食，甚至种子都被从河南省调走，造成农民不仅没有粮食，甚至连种子都没有，这就导致了河南成为大饥荒最严重的灾区。河南省内饿死人最多的地区，信阳地区，其地委书记路宪文，是因为吹牛从地级提拔起来的典型人物。他吹牛最狠，造成的饥荒也最惨。

激励机制中的“大棒”就是惩罚。在没有制衡和监督机制下，最高领导的好恶成了标准：只准报喜，不准报忧。于是，谁持怀疑态度就打击谁。时任河南省省委第一书记的潘复生对省长吴芝圃的吹牛表示怀疑，毛亲自把他定为“右倾机会主义者”，称其农业发展计划为“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不仅如此，河南省所有和潘复生相似的人全部被抓出来批判，整个河南省抓出20多万“小潘复生”。由于河南省内所有表达了对数据怀疑的干部都为此遭受了灾难，任何敢于讲真话的人都受到了迫害，才使得大饥荒发生的如此极端、悲惨。

## ◇ 走向灾难的地区竞争和地区实验

地区竞争与地区实验在文革后的改革开放中曾经起了非常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推动作用。但是，第一次在全国全面应用地区竞争和地区实验是在“大跃进”。而其作用是高度破坏性的。

“大跃进”的第一步是向地方政府大规模地放权。地方的实权使得地区竞争成为“大跃进”时期地方官员的基本激励机制，同时取代了市场机制和中央计划机制。与改革开放时期发展市场经济，地区之间竞争GDP不同，“大跃进”时期消灭市场，竞争的是钢铁产量、亩产、粮食总产等数量指标。地区竞争机制同时取代了市场机制和中央计划机制，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发布数量指标，要求地方竞争超额完成。超额完成指标的地区竞争是官员晋升的重要指标。

消灭市场机制意味着消灭了价格信号，这会造成决策者失去对市场的基本判断经济活动完全无法被准确认知。同时，“大跃进”时期把制订和执行中央计划所需要的，中央部委对企业的直接控制，以及党政内的一些基本技术层面的制衡机制都破坏了，把对信息的双重检验和核实环节的机制破坏了。

在地区竞争的背景下，各级政府努力调动所有能调动的资源投入各种建设项目，包括大量招工、无偿调拨农民的人力和财力，以求在竞赛中得胜。其中最重要的指标是农业中的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和钢铁总产量，即所谓的“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在失去制衡和监督的制度下，各级政府吹嘘自己能生产多少吨钢，吹嘘自己的亩产。

地区竞争的激励功能远超过生产和经济方面，而直接影响“大跃进”的制度变化。“大跃进”中创造的新制度人民公社，并非由中央设计，而是在地区竞争的激励下，在地区实验中自发产生，再通过地区竞争的激励，向全国推广的。“大跃进”初期，在向地方放权的同时，中共中央鼓励地方尝试新制度。“制度创新”也是地区竞争的内容之一。在全国地区竞争中一路领先的河南省，在1958年4月发明了“嵯峨山卫星人民公社”（河南省遂平县）。当时苏联在全世界首先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中国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为之欢呼，自己也要发射卫星，因此称这个制度发明为卫星人民公社。以后毛泽东亲自修订了嵯峨山人民公社的章程，发表在党刊《红旗》杂志上，在全国大力推广人民公社。在地区竞争的激励下，在1958年4到8月的5个月内，河南省通过地区实验和推广，建立了1300多个人民公社，全省99%以上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

在丧失所有制度制衡的条件下，在地区竞争的激励下，从1958年6月起，全国各地竞争上报的粮食亩产逐日升高。例如《人民日报》报道称，河南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小麦亩产7320斤（7月23日）；安徽繁昌县峨山乡东方红三社亩产中稻43075·9斤（8月22日）；湖北麻城熊家沟乡建新六社亩产中稻52599斤（9月1日）；广西环江红旗人民公社亩产中稻130434斤10两（9月18日）。为了掩盖作假，地方政府使用暴力压制报告真相的人。例如在毛泽东、刘少奇曾亲自涉足的全国共产主义试点河北徐水县，为掩盖真相，其县委书记在1958年8月和10月发起两次抓捕潮，共逮捕4643敢于报告真相的人，导致包括两名支部书记在内的31人死亡。

全面作假导致大规模征调农民的口粮，甚至种子，到城市或用于出口，使得全国连年粮食产量大幅下降。此外，农民发现入社后，不仅丧失土地，而且丧失家里的牛、马、毛驴等（刚刚四年前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承认农民的土地和生产工具的私有产权），导致大

批宰杀牲畜。在全面大规模强制性的征调粮食，和各地封锁实际粮食信息的背景下，引发了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饥荒，全国在三四年里几千万人死于饥饿。

“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朝着建立分权式极权制大方向的第一步。从此，全国的行政和经济的主要权力转移到了各级地方政府手里。由此大大削弱了中央部委的实际权力。同时，在占全国人口80%的农村，建立了“人民公社”的新制度。毛泽东将人民公社的基本原则阐释为“一大二公”和“工农商学兵俱全”。“大”是指规模大，“公”是指公有制。由毛泽东亲自制定的人民公社的章程规定一切生产资料为公社所有。人民公社的另一个基本特点，“工农商学兵俱全”，或“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意味着每个人民公社是一个小社会，政治经济不分，同时是工厂、是商业、是学校、是军事组织。把一个社会应具备的所有基本功能，都在每一个人民公社内全部实现。每一个人民公社是一个完整的社会，每一个人民公社自给自足，方方面面公社内部都能解决，不需要中央的计划、执行和监督。因此，不仅从制度上破坏了中央计划经济的基础，而且从另一个角度，从制度上进一步大大削弱中央部委的实际权力。这为强化最高领袖的权力奠定了基础。如果每个人民公社都效忠伟大的领袖，响应领袖的号召，在这个分权的极权社会里的领袖，就会有更不受制衡的政治权力。

在用地区竞争和地区实验取代市场机制和中央计划机制的“大跃进”中，在破坏了所有对权力的制衡机制的条件下，地区竞争变成了吹牛竞争。导致了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到1962年，大饥荒被制止后，中共中央召开扩大到全国的县级和以上的领导干部的七千人大会。毛泽东承认“大跃进”出现了枝节上的问题；宣布从此政府的日常工作由主席刘少奇主持，共产党中央的日常工作由总书记邓小平主持。但是，巩固和强化大跃进的“制度创新”不仅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因，也为文革的发动奠定了制度基础。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在“大跃进”时形成的分权式极权制的基础上发动的文革中，地区试验和地区竞争也是其基本机制。相似于人民公社的创建和发展，红卫兵是由北京的中学生发明，由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向全国推广的地区试验。而且，向全国推动文革的热潮，重要的激励机制之一是地区之间的竞争。例如，夺权运动首先由上海的实验开始，之后推向全国。在上海造反派于1月8日夺了中共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权之后，各地（省市县等等）造反派竞相以竞赛方式夺权：贵州1月25日，黑龙江1月31日，山东2月3日，等等；以求达到“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毛泽东，1966）。

□ 原载《金融时报》中文网

~~~~~

## 【研究评论】

### 平民之殇——关于纪录片《罪行摘要》

• 老 许 •

《罪行摘要》——纪录影片，纪录在文革中被判刑的14位农民的遭遇。（见徐星：“把文革中的农民计入历史”，载本刊zk1509b——编者注）

制片人：徐星

发行日期：2014年10月

我有点后悔看这部片子，看完之后至少十分钟无法言语，我被伤到了。《罪行摘要》两个多小时长，十几个“犯罪分子”的个人故事，没有编导的任何评论或暗示，老人们言语也朴实，甚至在镜头前有所克制，但我还是被伤到了。

在看这部纪录片的过程中，我自己的眼泪流了很多次，差不多从第一个故事中的父女泪别到最后一个故事老友相拥，我都有点忍不住，想掩饰而不能，突然发现自己好脆弱啊！

我们都是普通人，如世间的一粒凡尘，虽然微不足道，但作为活人，都有人的自然情感，有所谓同理心。在为他们的命运唏嘘长叹时，很难说没有物伤其类的哀伤，而且，这种哀伤经由影像呈现出的故事而凉凉地穿透了身体。

摄影圈有句自诩的话，一图胜千言。看这部片子，让我强烈地感受到图像的力量。形诸文字的东西和图像比，其实是先天不足的，就环境细节、人物情绪的准确真实而言，图像的说服力是无可替代的。

这些年关于文革的认知和评价越来越雾里看花莫衷一是了，可是，看过《罪行摘要》的人，都会更容易体会到，文革是一场人类历史上少有的荒唐闹剧，对命如草芥的普通人尤其如此。

我们在翻看历史时，看到的都是有权力有身份有影响力的人的历史，平民是不存在的，即使涉及，也被深藏在某个数字后面，没有具体形象可言。即使在回溯文革的事件和人物时，我们看到的也大多是官员和知识分子，毕竟他们有着话语权。所以，导演徐星能够把镜头对准普通农民，能拍出他们个人的苦难，还能拍得如此精彩生动，让我不佩服他，有点难。

三年时间，我不知道徐星从北京到浙江往返了多少次，其间辛劳自是一言难尽。而这些莫名其妙坐牢的农民都渐渐年事已高，能有人用心记录他们的冤屈，想必老人们会有些欣慰的。

转眼文革结束也已经四十年了，由于某种原因，现在的年轻人对这场灾难的了解十分有限，很多人还对文革抱有很多浪漫的想象。也许看过《罪行摘要》会增加大家对文革的了解，相比于可能得到各种帮助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平民的灾难才是最深重的。如果真有十八层地狱，处于最下面几层的，一定都是这些平民。想到我们也和他们一样，在社会上基本没有话语权，有朝一日，如果文革重演，我们就会变成当年的他们，每念及此，脊梁骨便有点冷飕飕的。

六年前，徐星在北京宋庄无意间发现了一张人像草稿，草稿背面竟然是一张文革时期的“犯人登记表”。徐星一点点翻找，一共找到22张，“犯人信息”都是“文革”期间的“现行反革命”，涉案者大部分是农民，被下放到浙江衢州十里丰农场劳动改造。这些登记表让徐星大受震动，他决定要去浙江寻访这些“文革中的人犯”，做一部他们的《罪行摘要》。

寻找用了一整年，拍摄一年多，又花了一年多剪辑成片。135分钟的纪录片，里面的14张面孔，最年轻的也已年过古稀，时隔50年，他们说出最多的词还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他们的罪名，在当年被冠之以“用气枪污蔑毛主席宝像”、“冒名借刀杀人书写反革命信件”、“吹捧刘少奇”等。

第一个人物，是一个“出身不好”的当年的中学老师，因为学生来访时恰巧停电，于是被污“企图通奸”和“破坏军婚”，自此万劫不复，尽管没有任何事实上的罪行发生。而信任他的十几位学生因为结伴去监狱看望他，也被定罪。最可怜的是他十三岁的女儿，在他的

妻子卖力检举他并离开之后，女儿用父亲学生们烧炭砍柴积攒的一百元钱去监狱看他，仅仅半小时的见面，父女被监狱的铁门隔绝在两个世界，那凄惨的哭喊久久回荡在观众的耳中。

六十多岁的林品新，坐在自家门口新刨出的红薯堆旁接受了采访，从他破碎的叙述中，偶尔能够听到“被抓”“脚镣”“老婆没了”。关于当时的经历，已经很难拼出完整的故事。只知道他因为对农村的困境有疑问给“中央文革”写了封信，就为了一封信，判了20年，罪名是恶毒攻击文革和社会主义制度。当被问起信的内容时，他说自己已经不记得了，在衢州十里丰农场的头一年，他把五十六斤的重镣挂在脖子上劳动。他说起这些就像在讲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这时，他87岁的老父亲闯进了镜头，提着一篮子红薯，他竟然还在干农活。最后，林品新撩起裤腿，脚腕上被铁镣勒出了永远也抚不平的深深印记。

周明夫，曾经是生产队的会计，因为有些文化而遭人嫉恨。他的罪名是“用气枪污蔑伟大领袖画像”。当时生产队有一杆民兵训练用的气枪，枪把已经沤烂了，第二天就来人把他给绑了，说他玩枪时瞄了毛主席像一下。房间里就三个人，他知道谁举报的，但他不说。

最有戏剧性的是胡竣录、程德华和翁志渝三人。他们由于出身不好，被划为“黑五类”，在很多方面受到歧视，处境艰难。于是三人就组成了一个小组，互相帮帮忙。但忽然有一天他们就被抓去交代问题。翁志渝说，“没有反革命组织，没有组织名称，”接着就开始被人用枪托猛砸，要他不仅承认罪行，还必须给自己的反革命组织起个名字。翁志渝说，“我必须想出一个名称来，不然就要被打死。”想了半天，他说了两个字：“启蒙”。而打他的审讯者对这个词完全不懂。几个人终于有了罪名——建立“启蒙领导核心小组”，既然是反革命犯罪集团，当然不会是几个人或一两个组织，于是本村、邻村一起凑了几十个人和多个不同名目的组织，这样一来，当地就可以因为破获了犯罪集团而邀功，而这几十个甚至互不相识的农民，或为此丧命，或为此身陷漫长的牢狱之灾。

程德华和翁志渝几十年记恨对方当年的表现，程认为是翁的“启蒙”害了自己，翁谴责程，如果不是自己给这个莫须有的组织起了一个相对中性的名字，可能他们几个人都会被枪毙。还是在徐星的撮合下，他们彼此相拥重修旧好，那一幕真是让人百感交集。

徐兴林，当年被朋友告发，说他参加反革命集团。从监狱里面出来快50年了，他一直不敢交朋友，他家离县城很近，但他几十年都不去县城。当年被冠上“参加903反革命集团，制造政治谣言，参与策划反革命暴动组织，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这个莫须有的罪名，让他不敢相信任何人。“政治这个东西我后来想想是很麻烦的，就凭嘴巴说说，但是我也没办法，拿不出证据来证明我自己不是这样的，你没有办法的，他说你是就是，你没有办法的。”

当徐星问他，在牢狱里有没有被打？老人家回答说，“打是难免的。两个手指头用牛筋绑好，手指头中间扎针，是这样的，一个个扎进去。”“扎针？扎多少根针？”“那是过去的事情，算了。”“这真有点可笑，这样子会成立罪名的，会判刑的，我到现在有的时候心里都在笑，心里都在笑。”徐星问他恨不恨害他的人，他说不恨。“一个呢，我想，过去了。第二个呢，他也是受人家的指使，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啊，那个时候，这个人性啊，都是没有心的，就是这个谁压倒谁，他身上垫一下就高一点，这样子的。”

如今的老人，大部分人都生活孤苦。他们中，当年只有两个人的妻子没要求离婚。其中一个的妻子，坚持相信丈夫的无辜，含辛茹苦地等待了十年，从22岁到32岁，头发全白了。当丈夫出狱回家时，长大的孩子完全不认识来人，告诉妈妈，家里来客人了！

这十几个人里，如今还有好几个是老光棍。程德华说，我现在多活两天少活两天实在没什么不同。从他们的叙述中，我们看不出他们有多少怨恨，麻木和认命是一种普遍现象。他们很少向人提及自己的遭遇，因为说了也似乎没人想听，有些孩子还会因此害怕。他们准备默不作声地带着这些冤屈的隐秘往事入土，是徐星的出现，才让他们的形象和故事得以保存。

在中国，有个奇怪的现象，普通民众似乎对明清的事情有更多的了解，而一旦涉及当代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则语焉不详了。对于文革，七十年代末期其实官方就有定论，简单说是十年浩劫。官方的完整措辞是这样的：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个结论应该是很清楚的，但在原因上则有些含糊其辞。领导者是谁，大家都明白，但就是不说破。也正因为这里的顾虑和含混，给后世留下了纠缠不清的孽债。

也因此没有人出来忏悔。好像大家都是控诉者，都是受害者，加害者却无影无踪。文革的确不是某一个人的责任，当年的中国人从上到下从城市到农村都是参与者。最苦的则是这些没有机会发出声音的底层平民，他们的命运不值一提，他们的苦难毫无价值。

但真的是这样吗？

我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罪行摘要》，希望更多人了解那段历史，至于文革好不好？文革是什么？我觉得真的不需要再纠缠这样的问题了，假如我们还有良知的話。

~~~~~

## 【人物春秋】

### 海燕与太阳——张春桥心路轨迹试探（二） ——《张春桥传》代跋

• 萧 木 •

（上接 z k 1 7 0 8 a）

#### （四）“庐山会议事件”与“谨慎再谨慎”

林彪决定对张春桥发起攻势，文章就做在三次争论上，时机则利用即将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后来习惯简称为庐山会议。

三次争论究竟选择哪次作为突破口，林彪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如果选择前两次，即关于对军队的表述，除了毛领导，还要不要再加上林直接指挥这么一句，和关于要不要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仅争权的色彩过于直露，弄得不好，还有可能直接与毛发生冲突，他不会那样傻。选择称“天才”问题，就要讨巧得多。首先张春桥是个软柿子，容易对付；其次“天才”问题有很高的理论含量，容易发挥；第三，称毛为天才，绝对不会有人敢于公开反对，而拥护者肯定几乎就是全体；第四，更为重要的再鼓吹一次称“天才”可以使自己继续拥有毛的最忠实、最积极的颂扬者的荣耀。这样到1970年八月二十三日庐山会议一开幕，林就发表了一篇与会议原定三项议程（讨论修改宪法和国民经济计划以及战备问题）毫不相干的坚持要称毛为“天才”的讲话。由于会上既发了称“天才”的恩、列、毛、林语录，又有“理论家”和几个“宣讲员”的鼓动，很快就掀起了一波高一波的“揪人”热潮，



又用文革中流行的“不点名的点名”的方法，以“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名，准备对张来一个“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庐山会议这场突发性的斗争，表现形式是一哄而起。有些人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楚事情原委，听说要揪的那个坏人是“反对毛主席”的，反正以“保毛”的名义既可保证自己“安全”，又可显示自己“革命”，也就紧紧跟上。这是集权体制长期影响又在文革中经“大民主”的放大而形成的一种极坏的风气。不过这只是表象。从根本上说，庐山会议这场斗争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并大体完成了夺权斗争以后，在权力再分配过程中的一次内讧。“无产阶级司令部”是由文革派、军官集团派和功臣派三种力量结合而成，或者说是这三者的“临时联盟”。其中军官集团派力量最强，特别是“三支两军”后更可谓一派独大，庐山会议的斗争就是这个派与文革派之间展开的。一个“权”字是这场斗争的总矛盾，“接班人”问题则是幕后设计时的引爆点，而之所以选择张春桥作为“靶的”，还由于张有两个“软肋”容易引发众怒。一是他的所谓“叛徒”问题已为不少人所知；二，还有一个由历史造成的矛盾。尽管军队内部也存在诸如这个方面军与那个方面军、这个野战军与那个野战军之间的种种矛盾，但有一点他们是一致的：武官对文官，或者说枪杆子对笔杆子的根深柢固的轻视。中国有着数千年的“打天下、坐天下”的传统思想影响，加上1949年以来暴力革命几乎已被图腾化，不仅枪杆子里面可以出政权，甚至还断言“整个世界”也“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在这种氛围下，不是扛着长枪大刀，而是拿着一管笔参加到革命队伍来的就被认为有一种“原罪”式的缺陷。陈伯达是中共党内老资格笔杆子，但在1966年十一月召开的工交座谈会上面对功臣派的重重压力，还是发出了“反正我们写文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的哀叹。张春桥的资历与陈伯达还不可比，而“九大”后竟然跃居到了政治局委员的高位，这让功臣宿将们怎么也无法接受。颇能说明这一点是，张在被任命为南京军区政委后，毛泽东曾巧为安排，满心希望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能与张春桥这个政委唱一出《将相和》，其间，还让张到南京去对正在被造反派“炮轰”中的许世友表示支持。开头许也颇为感动，但在他走出困境后，再也不把张放在眼里，还对人说：“笑话！我有几十万军队，还要他张春桥保吗？”许的秘书李文卿在《近看许世友》中说华东地区军队干部都知道许世令写打油诗讽刺张春桥的事，显然他是把这作为许反对“四人帮”的一项光荣业绩来称道的。打油诗开头说：“戴眼镜，夹皮包，会写文章能提高”；最后一句是：“打起仗来向后跑！”

在庐山会议这场斗争中，周恩来的表现颇为特别，不过如果联系一下文革历史也不难理解。周是毛发动和推进文革最得力的助手，同时也是功臣派的当然代表。在上面提到的以毛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功臣派的力量相对较为单薄，周的资历、地位又决定着在思想感情上总是倾向于曾经为中共创建全国政权身经百战立下汗马功劳的军官集团派，再加上平日在主持国务院工作中经常受到文革派，特别是江青、张春桥的得寸进尺的挤压，因而他会与军官集团派走得比较近，包括庐山会议上在毛泽东写出《我的一点意见》前对军官集团有所支持，也该是合乎逻辑的事。此类实例，在黄、吴、李、邱等回忆录中多有记述。如《邱会作回忆录》说：军委办事组给中央的有些请示报告，“周能批的则批，不能批的就请示毛主席批，批回来再在政治局传阅，有些不方便的事就不传阅，因此军队内的许多事情文革派那一边不知道”。又说：“‘九大’后到庐山会议期间，周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表面上对江青一伙和我们是‘公正’的，但实际上是支持我们的。有一次总理找我个别谈话，他说：‘今天晚上你有什么话要同我说的吗？’我懂得总理说话的意思，就把我知道的事（总理不知道的）全部对总理说了。总理很高兴，说：‘你帮我做了心中有数的事。’从此以后，总理对我们的支持直到‘九·一三’基本都没有变。”

当然决定一切的，还是要看毛泽东的态度。

虽已年近八旬却依然还能“洞察一切”的毛泽东，对庐山会议这场斗争中暴露出来的种种矛盾可谓一清二楚。但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同时又是一位垂暮老人，当他目睹这场“大有炸平庐山之势”的斗争在面前爆发时，还会有他的独特的观察角度，我们不妨把他的这种独特的观察角度概括为“两条船思维”。两条船也即此前他已说过多次的“两个司令部”，但“两条船”更人性化，凝结着更多的人世沧桑的苦涩以至血泪。如果我们联系一下中国帝王制度历史，那么你不能不承认这个“两条船”的观察是相当深刻的，甚至深刻到了可以照出一些人隐秘的灵魂深处。

林彪是上了党章的“接班人”。在中国古代史上，太子既立，皇帝已老，臣子们尤其是近臣们，就会或明或暗争着前去趋附东宫。这几乎成为一个规律，尽管《南齐书》作者萧子显把“君老不事太子”作为历史“遗训”向天下为臣者提出忠告，但愿意照着做的历来寥寥。道理很简单：你不事先多长个心眼，等到老皇帝一“驾崩”，新皇帝一登基，还能有你的位置吗？更不要说如果你与老皇帝走得太近，一旦新皇帝忽而记起恨来，连脑袋也很可能要搬个家呢！

此刻，我们的毛主席他老人家，眼看着自己的“接班人”那种“一呼百应”的景象，就会不由想起两条船：一条是自己的船，另一条是“贼船”；一句俗话：老鼠搬家。看到自己已是一条将沉的船，而船上老鼠们正争先恐后地向那条快要起锚扬帆的“贼船”搬去，就会不由升起一种日薄西山的悲凉。老人家甚至已不掩饰内心的悲凉，见到许世友，伸过手去说：“你摸摸，我手都凉了。我只能当导演，不能当演员。”意思是要许去做做工作，把那些“搬家”的人劝回来。哪晓得事后一查，才发现其实许世友也是搬过家的，还向林彪写了信。不过经过几天苦苦的观察和思考，毛泽东这位文革统帅还是写出了《我的一点意见》，至少在文气上已回复到了固有的轻松和幽默。鉴于林彪是上了党章的“接班人”而参预“搬家”的队伍又相当庞大，确定应对的策略是偏于保守的：稳住林彪；对带头“搬家”的汪东兴、陈伯达则一保一抛，即暂时留下汪以观后效，而将陈作为“反面教员”抛出，以儆效尤；然后设法逐步将众多“搬家”者再或“逼回”或“召回”或“请回”到自己船上来。至于整个处理方针，老人家信手拈来了一句通俗生动的歇后语，叫作：“孔夫子打牌——和为贵。”

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真可谓“一言九鼎”，按照他自己后来与到访的法国外长舒曼谈话的说法，只用了“一滴酒精下去，细菌就不活动了”。一场翻江倒海的风暴就此平息——当然实际上只是表面的、暂时的平息。

作为事件的“焦点人物”张春桥，在庆幸再次获得解救的同时，又一次面临“别无选择”。应当说他也是很愿意、很积极地去陪孔夫子打一局又一局的牌，遵照总导演的分配，扮演的是一个倡导“和为贵”的角色。于是在下庐山前，他与曾经喊过把他揪出来“批倒批臭”以至“千刀万剐”的人们，握手、谈笑。有人说“冒犯了，对不起”时，他赶紧朗朗笑着接一句：“我不在乎！”对许世友，还遵照毛的指示，特地设席宴请，举杯修好。

张按照毛意图扮演的此类“和为贵”的角色，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二年四月中下旬在北京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上。

上海去参加这次会议的是王洪文和徐景贤。通知时原说要他们在会上作批判性重点发言的，因而要我作为工作人员与他们一起去，以便随时按照会议要求为他俩起草发言稿。大概在庐山会议那场斗争中上海代表大多“站在正确路线上”多少有点以为“我们胜利了”的自我感觉吧，到北京京西宾馆住下后，王和徐都有点兴奋，也颇为活跃，会议间隙经常到其他省市代表所住房间去串门，还两次到钓鱼台去想拜访康生和张、姚。结果是：一些省市的领

导人大多还是把他俩视为“造反起家”的小人物，不怎么肯答理；钓鱼台那边，康生因病不便接见，张、姚也没有见到，未免有点扫兴。

四月二十九日汇报会结束，周恩来作总结报告。刚讲到“几位犯错误的同志只要真正愿意改正，我们就要采取欢迎帮助的态度”时，会场上出人意料地有人鼓起了掌，很快热烈的掌声已响成一片。这时鼓着掌的张春桥笑容满面地从座位站起，接着是姚文元、江青也站了起来，主动向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一一握手，全场一片欢腾。

后来知道，周恩来的总结报告稿起初是由会议秘书组起草的，后经政治局讨论，专门成立了一个有周恩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纪登奎参加的六人修改小组。秘书组起草的初稿对黄、吴、李、邱等错误的调子定得比较高，写了好些重话、过头话，六人小组修改时将调子降了下来，删去了那些重话和过头话。吴法宪在《回忆录》里也这样说过：

“特别是张春桥，后来黄永胜告诉我，很多话（指重话和过头话）都是张春桥提出删改的，对我们表示友好。”

原来毛泽东对这次会议有过指示，说“还是要回到‘九大’路线上来，要团结、胜利。人家已经检讨了，就要鼓掌欢迎。”

这天会议结束时，张春桥手里拿着文件兴冲冲从会场出来，王洪文、徐景贤迎上去问了好，又说了他们准备第二天就回去，问张对上海工作还有什么指示一类话。张突然沉下了脸，皱了一下眉头，说：“你们很活跃嘛。”那语气听来有点像在训教两个不懂事的孩子。很明显，张是在对王、徐四处串门，又两次去钓鱼台找人有些不满。接着又换了一种较为缓和的语气说：“我过去在市革会扩大会上讲过，《智取威虎山》里少剑波要求杨子荣做到四个字：‘大胆、谨慎’。又大胆，又谨慎，对立、统一，这是符合辩证法的，那时我说我们也要照少剑波说的话做，既要大胆，又要谨慎。但现在我不要你们‘大胆’，只希望你们‘谨慎’，谨慎再谨慎！”

王、徐听了表情也一下沉重起来。因为实际上他们也看到了：这次会议鼓掌、握手的“团结”只是表象，背后反映出来的种种却是吉凶莫测。会前，毛泽东曾让周恩来带着黄永胜等前往北戴河去看望在那里休养的林彪，实际是希望林能来参加这次汇报会，趁此机会说几句话，让他好有个台阶下来。但尽管周一再委婉表达此意，林却始终避而不谈。后来总算回到了北京，但就是不肯到会场来露面。

更为严重的问题，则是“九·一三事件”爆发后才知道的：就在批陈整风汇报会前二十几天，根据林彪要“先搞个计划”的指示，林立果与他的“联合舰队”几个主要成员已制订了一份针对毛泽东、张春桥等文革派的“武装起义”计划，用谐音起名为《“571”工程纪要》。

党的“十大”后，张也仍然要求上海要谨慎。记忆中，与我有点关系的，就有两件事。一件是，我在某省一个文艺刊物上读到一篇反映文革的小说，觉得存在一些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又较有普遍性，就向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朝霞》等文艺刊物的陈冀德提了个建议，可否对这篇小说的不良倾向作些评论和批评。《朝霞》发表批评文章后又过了一个多月的1974年四月初，张春桥在给上海市委领导马天水谈工作的一封信中，又谈到要谨慎的问题，特地指出：“《朝霞》、《学习与批判》、《文汇报》、《解放日报》，都不要发表批评外地报刊的文章。如果要批，需请示市委。”

还有一件是1975年四月下旬，我因有事要回上海去向张告别。闲谈中，张说你顺便代我去向市委几位领导说一声：“上海不要多出头。让北京、辽宁出头，我们在后面跟着学。”

#### （五）“再生”与“野心”

邱会作在回忆录中说的周恩来对军官集团派的支持，从“‘九大’到庐山会议期间”，“直到‘九·一三’基本都没有变”，这些情况当时张春桥并不知道；不过也是发生在庐山会议期间有一件事，却让张不由得要问个为什么。这事几年后他向他女儿维维说起过。张说那天（指八月二十五日）早晨他看到六号简报（载有陈伯达、汪东兴在华北组的发言，会上提出要把某个极端反动的野心家、阴谋家揪出来千刀万剐等信息）大为吃惊，就去找江青；江看了也认为问题很严重，两人就一起去找周恩来。周却让工作人员推说已入睡不便接见，江、张只好直接去找毛泽东，毛接见后，周才叫江、张进去谈。张说：“当时我心里就有些纳闷，不知道总理是怎么回事。”

这一节就来侧重谈谈张与周的关系。当然说到底，张、周关系同样也要从两人与毛的关系中去理解。

文革中，稳健持重、日理万机的周恩来，不仅在各级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中拥有很高的声望，得到他们由衷的尊敬；各群众组织无论保守派还是造反派，也几乎是一致的拥护和爱戴。我本人，“十大”期间和“十大”后作为工作人员，与周只能说是稍有接触，也不禁为他那种忘我的工作精神和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还有和蔼慈祥的长者气度，深深受到感动。如果拿周与毛作个比较，那么应当说，周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理解以至具体的决策、策略，都与毛有着相当的距离，而他所处的地位又让他不得不努力跟上毛的思路日以继夜地去尽心尽力地工作。他做得确实很辛苦，很困难，有时还很无奈。他自己也不止一次说过这类话。如1966年八月十八日与越南总理范文同谈话时就说过：“新的革命运动，我们这些老革命就不熟悉了，变成了‘保守派’。我们跟主席一道工作，有时毛泽东思想举得不高，错误是经常要犯的，当然不是站在对立的立场上。我们要保持晚节，就要紧跟毛主席不掉队，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住考验。”不妨说周恩来努力想“保持晚节”的晚年，就是整整一部文革史那种曲折、艰难和复杂的缩影。

文革初起，张与周无论资历、声望还是能力和经验等方面都远不在同一条水平线上，根本不可能在获取毛信任和重用上成为周的竞争对手，加上周一向以温和待人，所以两人关系还是相当好的。但自张对“安亭事件”作出了违反周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的一致意见的处理，却得到毛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后，周突然感觉到了来自张的那种咄咄逼人的威胁力。其后，张越来越受到毛的重视，张、周与毛，渐渐地便形成了一种三角式的角逐关系。这一点，可以从两份张春桥参预起草的文件的比较中，得到清楚的说明。一份是

《五·一六通知》附件：《1965年九月到1966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文中四次出现周恩来的名字，都是正面形象。全文留给读者的印象，周是毛发动文革的得力助手。张这样写，应该是周希望中的。当然，《大事记》体现的是毛的意图，张或参加起草的王力等都不会、也不敢自作主张。另一份是准备向毛汇报的“大闹怀仁堂”的《记录》。“大闹”是1967年二月十六日在周主持的碰头会上发生的，《记录》对几位副总理和老师的话整理得很详细，对作为主持人的周的话却一个字也没有记。实事求是地说，周在会上对正在激战中的功臣、文革两派，还是尽量想做到不偏不倚的，有限的几次简短的插话，也是字斟句酌，为保持中立用足了心思。其间有一次插话，似乎稍稍有点“越轨”，后文还将提到。当然从内心说，周不可能不偏向于功臣派。整理这份记录除了张春桥，还有王力、姚文元。他们只字不提周的几次插话，我的理解，不大可能只是一时疏忽，应该是经过

反复权衡后的有意省略。这种省略，曲折地反映了他们对周在会上态度的不满。《纪录》在上报毛前，先请周过目审阅。周一看就明白了：这不是要用《纪录》这样一种形式，到主席那里去告我的状吗？因为周作为碰头会主持人，如果对功臣派的“大闹”没有明确表示反对，那他不仅要发生会上的那种显然为毛所不能容忍的政治倾向负很大的责任，而且很可能还有被划入“大闹”派的危险。

陷入了尴尬的周恩来，肯定会对带头告他这一“状”张春桥留下深刻的印象。怎么办？为了“修补”一下自己的“形象”，周不得不亲自在这份《纪录》上加了两段文字。一段是在谭震林拿起公文包、披上大衣：“‘让你们这些人去干吧，我不干啦！’说着愤然离场”处，加上：“周恩来狠狠拍了一下台子，大喝一声：‘回来，坐下开会！’”另一段是陈毅在激愤中带出了延安整风旧事，说“总理那时不是也挨整了吗”处，加上：“周恩来插话：‘应该检讨，整得对嘛！我是有错误，对当时的批评，从来没有意见。’”

但周的补充同样也有“省略”。而且“省略”的，恰恰就是那几句似乎稍稍有点“越轨”的话。“大闹”中，当李先念说到《红旗》1966年十三期批判“资反路线”的社论一发表，“全国老干部被统统打倒”时，周立即接过李的话头，对着康生、陈伯达追问《红旗》社论的事，说：“这样大的问题，你们也不跟我们打个招呼，送给我们看看嘛！”这段明显与功臣派的“大闹”站到了一起的话，周就没有“补充”上去。

事情到此还没有完。

“大闹”当天晚上，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一起去向毛泽东汇报了“大闹”的整个过程。毛开头还较为平静，后来越听越恼火。偏在这时，张又插话补充了周在“补充”时“省略”了的《红旗》十三期社论那件事，并说：“总理对社论没有送他审查有意见。”这期《红旗》社论是毛审阅后批准发表的，他听了自然大为不满，说：“党章上没有规定社论要经过常委讨论嘛！”这不妨理解为毛的一句气话，因为后来事实上并没有形成这样一项制度。毛对周有“气”，大概也不只是周对《红旗》社论没有送给他审查有意见这一件事，主要恐怕还是不满于周作为碰头会的主持人却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大闹”。正是在这样一种状况下，毛萌生了一个后来很快实施了的想法：让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书记处。毛要张去找周“谈一次话”，说要周“把中央文革当成书记处看待，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提到文革小组讨论”。

周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作为最有资格代表中共元老的一位老革命家，竟落到了要后生晚辈张春桥手持“最高指示”来“谈一次话”的地步！尽管为了“保持晚节”，他依然会很乐意地接受，并“紧跟毛主席不掉队”，但他内心会对张春桥这个“小记者”作何感想，我们也不难想象到。

1968年四月，上海发生了第二次全市性的“炮打”事件——“四·一二事件”。对张春桥来说，这次“炮打”真正具有威胁力的，不是最先发起者《文汇报》“星火燎原”造反总部大多凭猜想提出的《十个为什么》，而是有人出乎意料地揭发出了他的“叛徒”问题。

最先在南京路一带贴出震惊全市的“揪出大叛徒张春桥”这张大幅标语的，是属于解放军总后勤部的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一个叫“红旗”的群众组织。“红旗”在部队属“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保邱会作的，因而邱很快便拿到了由“红旗”提供的揭发张有“叛徒”等历史问题的材料。《邱会作回忆录》对此有这样一段记述——

我拿到这些材料不知怎么处理好，一次利用开会的机会，给总理嘀咕了几句。总理很慎重地说：“这个材料你不要转给我。”稍等片刻总理又说：“群众来信我是可以收到的。”总理的话提醒了我……

“提醒了我”什么呢？邱没有说。不过按照1949年以来政治斗争的惯用招数，人们也不难猜到。由邱送周、周再往毛那里送，那不就有“搞宗派活动”嫌疑了吗？改成“群众来信”，就不必再有任何顾忌。

于是，经过邱的一番安排，三两天后，一封由“红旗”署名的揭发材料，作为“群众来信”送上了周恩来的案头。

张春桥的所谓“叛徒”问题，当时在上海，不止是以“工总司”为代表的大多数造反派和我们这些以市革会工作人员为主的“保张派”不相信，就是一般干部群众也很少有人相信，即使参加“炮打”的人相信的也不多。最简单也是最有力的证据是：张历史上从未被捕过，“叛徒”云云，从何说起。近年来也已有学者经过详尽考证，否定了张是叛徒的说法。以周恩来的睿智和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当不难对这封“群众来信”提供的虚假材料作出否定的判断。但他还是决定持基本肯定的态度，并作为一个重要问题上报了毛泽东。

人们自然要问：这是为什么？

坦率地说，我在刚听到这些“内情”时，也是这样一遍又一遍地问过自己，怎么也无法想象，这样一种有违寻常道德的做法，会与我心目中几近完美的周恩来总理的形象联系在一起。是后来那十几年的高墙铁窗生活教育了我这个十足的书呆子，让我懂得了其中的一个道理：这就叫“政治”。

与此同时，军队系统也在积极行动中。先是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给叶群送了一份揭发张春桥“叛徒”等问题的材料，叶修改后退回江命他重抄一式两份，然后报林彪批示发出：一份送毛泽东，另一份送陈伯达、康生、江青。

这样，在中央就有了周、林两条线都抓住“叛徒”这个极具杀伤力的问题，对张形成了一个包围圈。后来林立果“小舰队”特地在《“571工程”纪要》的“实施要点”中列上了这样一条：“一定要把张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的叛徒罪行。”

当然最终还是要看毛泽东怎么表态。毛作出的回应只有两个字：“不查。”这“不查”是什么意思？似乎藏着玄机。我的理解是，毛对揭发张“叛徒”问题的那些材料已大致作出了否定的判断。那又为什么不索性彻底查个清楚明白呢？这是因为自从1967年三月中央下发了有关“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材料和批示后，“抓叛徒”几乎已成了一项全国性的群众运动。在这样一种政治氛围下，你一查，不是旷日持久就是越查越复杂，甚至不是叛徒也“查”成了叛徒。而张是毛继续推进文革亟需依靠的助手，在用人问题上，毛采取的是南宋陈亮上书光宗皇帝时说的那个“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方针，继续坚持要用张，因而回答周两个字：“不查。”

周对毛的指示从来是不折不扣执行的，这次当然也是。他只好对邱会作说：“主席不让查。”不过周自己，对张的这条尽管虚假但威胁力极强的“大辫子”还是紧抓不放的，就我所知至少还抓过三次，后文还将提到。

回过头再来说已被笼罩在“叛徒”问题黑影里的张春桥。

尽管“四·一二炮打”因毛让三军领导表态支持张而很快平息了下来，但对张春桥来说，更让他担心的还是那个虚假的所谓“叛徒”问题。在“炮打”期间，毛曾命吴法宪派飞机将张接到北京，并就如何正确对待群众“炮打”问题谈过一次话。但没有提到张最关切的“叛徒”问题，张自然既不便主动询问，更不敢自行申辩。他急切地企盼着伟大领袖对他的“叛徒”问题最好也能有个明确的表态。在那些等待的日子里，可真是分分秒秒都关系到政治生命的生死荣辱啊！要知道，文化大革命要整的重点就是“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叛徒”是比“走资派”更严重的罪名，只要一沾边，就成了“彻底打倒”的铁案！

那么周会不会把“主席不让查”的话同时告知一下张呢？大致可以肯定：不会。这样笼罩在张头顶的那个“叛徒”的黑影，便久久无法消散。

在我的印象中，这以后的张曾有过一段或长或短的“沉闷”期。尽管在公众场合依旧谈笑风生，但若是小范围开会，譬如与我们几个起草文件的人一起讨论时，忧虑之色总是隐隐挂于眉宇间，说话不多，有时考虑问题也会较多从负面着眼。我印象中的张的这个“沉闷”期，大约持续有半年多或近一年吧，在这以后的筹备和召开党的“九大”期间，张从毛那里接连得到了两个让他欣喜和激动不已的信息。先是1969年三月中旬，毛因不满于陈伯达的一再拖延，决定改由张、姚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紧接着在“九大”闭幕后毛亲自主持召开的一中全会上，张被选举为政治局委员。从这两件事释放出来的信息清楚表明：毛已否定了张的“叛徒”问题。因为很显然，毛决不会让一个叛徒或有叛徒嫌疑的人起草“九大”政治报告和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在那些日子里，张会有一种终于摆脱了千斤重负的轻松感，同时对毛油然而升起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崇敬和感激之情；特别是当他后来知道毛对他的始终不变的信任是在排除了由周、林两条线组织起来的那个“叛徒”问题“包围圈”的干扰的情况下作出的，这种感情更会无数倍地加深。如果说，1958年的那一次接见和一次“点将”使张对毛深感“知遇之恩”的话，那么这一回能够从这个致命的“叛徒”重压下获救，更让他感受到了毛对他有一种“再生之恩”。他会想起一句古老的话：“士为知己者死。”从此为贯彻执行毛意图、指示，真可以做到万死不辞。

“九大”后的那年夏天至初秋约有两个多月，张都在上海。留在我脑海里的印象，这该是张在文革十年中少有的心情舒畅，甚至还颇有点悠闲自得的一个时期。一回到上海，他就让秘书把朱永嘉、王知常和我（当时我们三人都是《红旗》杂志上海组稿组成员）接到他所住的市委兴国路招待所，一脸欣喜地说：“这次回上海，是主席那里请了假的，除了工作，就是读书。我特地把你们请来一起读，读的就是主席的书。”

原来这时张领受了一项任务，该是他企盼多年、最希望也最有兴趣做的一项任务：编辑《毛选》五卷。1966年七月中央曾成立过一个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主任刘少奇，副主任康生、陈伯达、陶铸；委员有李井泉等十四人。张春桥不在其中。随着文革的不断推进，编委会成员不是被打倒，便是被隔离，已所剩无几。1967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找了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开过一次会，讨论了《毛选》五卷编辑问题，没有正式名称，算是编辑小组吧。“九大”前后，陈伯达不再受毛信用，也不再管事；康生则因病休养，因而这个编辑小组具体做编辑工作的，就只有张春桥一人了。那天张与我们三人约定：每周两到三个下午，或下午再连晚上，一起读《毛选》五卷校样。从头到尾的读，逐字逐句讨论，提出包括文义、字句以至标点符号等的各种修改意见。每讨论一次，由我们三人整理成一份记录，再由张自己按选集目录逐篇提出书面意见送康生，康审读后上报毛，张说：“最后还是要由主席自己去定。”

我们三人那时当然非常高兴，且深以为荣。每次讨论，张也都是兴味盎然，常常联系校样内容，谈他亲身经历的一些人和事，用以说明毛看问题确实要比当时任何人都高明、深刻。这样一个下午的时间就不够用了，有好几次欲罢不能，只好晚上继续。遇到这种情况，就由张请客，供我们三人各享受一碗赤豆汤或小圆子一类点心。

大约到这一年深秋，《毛选》五卷清样读校完毕，张就回了北京。再来上海已是第二年四月，接下去便是毛带着他到苏州去与林彪作了那样一次“根本谈不拢”的“苏州谈话”，再后来就爆发了“庐山会议事件”。1971年五月初，开完“批陈整风”汇报会，张又来上海，留给我的是一个疲惫不堪的印象。不过这一次带回来的也是毛交给他的任务，倒又是他最希望做、也是最感兴趣做的事：为中共创立五十周年写一篇纪念文章。不言而喻，毛的这种安排，已把张作为党内第一枝笔来使用，这正是张深以为荣的事。为收集资料和起草这篇文章，临时搭了个班子，除朱永嘉、王知常和我外，又另找了几位，共七、八个人。张与我们一起阅读、讨论了多次，心情也似乎越来越舒畅，经常是侃侃而谈，笑声朗朗。三两个星期后，文章已大体完稿，实际上这篇文章主要还是他自己写成的。在这期间，一次讨论完文稿后，张点了根烟，感叹一声说：“文化大革命忙忙碌碌，想读书也没有时间。倒是上次与你们一起读校《毛选》五卷清样，和这次一起写这篇文章，总算静下来读了点书，看了点党史材料。人生易老，时间总是不够用。我这一生有一个‘野心’，就是想写一部《毛泽东传》。”

有关这个“野心”的话，张后来还说过一次，那是在“十大”闭幕当天傍晚在人民大会堂就餐时说的，不过那似乎已有了一种别样的含义，请看下文。

#### （六）“领导危机”与王洪文入选

张春桥在与我们一起讨论起草上面那篇题为《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的文章时，特别强调：“一定要引一段林副主席的语录。”我们当然照办。文章到定稿，林的语录引了一段，还有四处提到林的名字。政治局讨论时，周恩来又加了一句称颂林主持编辑出版毛《语录》的话。这些，体现的大概都是毛的意图吧？谁也没有想到，这篇作者署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的文章发表后过了短短七十五天，就爆发了林彪“机毁人亡”的“九·一三事件”！

毛泽东对这一文革中最为严重的事件的反应，却是一如既往的淡定和风趣。譬如当林彪驾机出逃，有人请示是否派飞机拦截时，他的回答是：“‘天要下雨，娘要改嫁’。不要阻拦，让他去吧！”待到又有人来报告，说林的飞机已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他居然说要感谢林彪帮了大忙，还颇有兴致地举杯庆贺，并随口吟出杜牧七绝《赤壁》，首句就有“折戟沉沙”四字，给林所乘的“三叉戟”飞机折坠于异国沙漠来了个绝妙的写照。但这一切，十有八、九都是为了稳定“军心”进而稳定大局做给别人看的，实际上，上了党章的“接班人”的“自我爆炸”，不仅标志着文革一次很大的失败，还有个如何向国内外作出说明的大难题，这给毛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据一位保健医生回忆，那几天毛服两三次安眠药也睡不好。从这时起，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以至到1972年二月二日因肺心病发作而突然休克，经一番紧张抢救才慢慢苏醒过来。同年五月十八日，周恩来也被查出患有膀胱癌。真是不幸连着不幸啊！

但凡文革过来人，大都会对1972年及其前后这段时间那种特有的沉重、不安而又敏感留有深刻印象。林彪已“机毁人亡”，而掌握着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毛泽东，人们虽依旧在祝愿他“万寿无疆”，他自己却说：“还有一二年也不一定，阎王请我喝烧酒。”这么大的一个党、一个国家，谁来接班啊！国人都在翘首企盼着，却又因“九·一三事件”的爆发



而对“接班人”这三个字已讳莫如深。中华大地，一面照样到处红旗飘飘、锣鼓喧天；一面却陷入了深深的忧虑。那时的大多数人，尤其是我们这些积极投身文革的人，决不会去想是否1949年以来实行的政治体制出了什么问题，相反，一如既往地相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至今最先进的，多位中央领导人年老多病，那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嘛！还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伟大领袖一个人身上，希望老人家能享有更高的寿数，健在时能把“后事”安排好。

在当时八亿人中忧虑最深的，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本人。当然，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者的毛泽东，估计也不太可能从政治体制上去思考面临的问题。他是怎么想的？也许从后来在与来访的越共领导人黎笋谈话中，可以感觉得到这位文革统帅内心深深的忧虑。在介绍了自己和周恩来、康生、叶剑英等的健康状况后，毛突然说出了一句让客人颇为吃惊的话：“我们现在有领导危机。”

正是这个“领导危机”既折磨着伟大领袖，也折磨着当时亿万中国人。

从1970年四月“苏州谈话”等透露出来的信息看，毛泽东确实很可能曾经属意于张春桥，当然不是马上撤下林来换上张，而是把张培养为相当于党的副主席的位置上，至于以后的事，还要看发展。但“庐山会议事件”的爆发，使毛看到反对张的人太多，至少近几年内很难进入考虑接班人选的范围。这一点，可从《南巡讲话》中谈到培养接班人时，只列举了李德生、华国锋、纪登奎、王洪文等而没有提到张可以看出。但如果不提张春桥，眼前能够掌控全局的就只剩下一个了，那就是持重稳健已担任多年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

前些年有的文革著作已提出，毛在病中曾当面向周交代过“后事”，也即一度曾有要周接班的意思。此说虽无可信的文献为据，但在当时，周的人望确实很高，为张所远远不及。有件事我印象很深。1972年五、六月间，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海有王洪文、徐景贤等参加，我作为工作人员也一同前往。会议快结束时，周恩来接连作了三个晚上、长达六个多小时的题为《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报告，详尽地回顾了自己在历次路线斗争中的错误，大概意在以此启发教育在林彪问题上犯有错误的干部放下包袱迅速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会议发的有关各小组讨论的《简报》，几乎全是为总理的“襟怀坦荡”、“光明磊落”所深深感动的信息。王、徐等在私下议论时说，他们事先都不知道周要做这么重要的报告，会议作这样安排，很可能表达的是毛的意图，那就是要让周接班。后来徐景贤还告诉我，他到一些省市代表所住的房间去“串连”，他们也在这样私下议论，而且对周接班都很高兴，表示完全拥护。但毛对周似乎并不怎么满意。认为周不是能高瞻远瞩统揽全局的帅才，对共产主义理想又不够积极、坚定，守成有余而进取不足。一句话：偏于保守。

为了尽快解决这个“领导危机”问题，大约到1972年年初，毛在发生一次休克后精力稍有恢复，就开始构想“九大”后的第二次高层人事布局。与两年前“苏州谈话”前后的那次布局最大的不同是，这一回林彪已经出局，在培养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中青年干部问题上，更可以有一些突破性的考虑。这期间，他在与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谈话中一再提到“要搞年轻人来当共产党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年、中年也可。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还说了“我们老一辈子人是过渡时期的人，不要总出台唱戏呀，我们出台转一转就行了，像《西厢记》上的老夫人，要让红娘去演戏”这样的话。一度还曾提议组织一个顾问委员会，由他当主席。此议后因政治局讨论时都不同意，他就说：“你们大家不赞成，我只好鞠躬尽瘁。”在这次布局构想中，后来引起国内外特别关注的人物，就是上海工人造反派带头人王洪文。

毛泽东大概是在1966年十一月处理“安亭事件”中那几天里，第一次听到“王洪文”这个陌生的名字的。从那以后，便通过多种方式对这个“种过地、当过兵、做过工”的年轻人作了多方面的了解和观察，这样在《南巡讲话》中说到培养接班人时就已提到了王洪文，到1972年九月，更正式向政治局提议调王来京“参加中央工作”。在此前后调来参加中央工作的，还有华国锋、纪登奎等几位。也就在这段时间里，围绕着是批判林彪的“极右”还是“极左”的问题，张春桥与周恩来发生了一次直接较量：周主张批“极左”，张主张批“极右”。这场几近公开的较量，不仅牵涉到各个领域、各项工作，还影响到从中央到地方不少干部群众也卷入其中。最后自然又是毛泽东不得不出来表态作结。十二月十七日，毛在与周、张、姚的谈话中指出：“批极左，还是批右？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林彪路线实质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这也就是说，主要不是批林的“极左”，而是批林的“极右”。争论双方表面上算是就这样“统一”了起来。

如何来理解毛的这个表态，不仅几十年后的现在有点摸不着头脑，就是当时也颇费猜思。我的看法是，庐山会议后，毛紧抓不放的一件大事，就是要解决他在《南巡讲话》中提出来的“谁知‘三支两军’掩盖着庐山会议的主要倾向啊”，也即要解决军队在国家权力构成中因“三支两军”而空前膨胀起来的问题。“九·一三事件”后，更明确提出“批林整风”，“批林”的核心就是解决军队问题。其后采取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等一系列措施，也都是为了扭转这个“主要倾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周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确实不怎么符合毛的“战略部署”。此其一。其二，批“极左”，必然会触及到造反派，有的地方还有可能把已经掌权的造反派打下去。这与毛正在构想中的要多培养些经过文革锻炼的年轻人的布局，也是相左的。还有第三，在毛看来，凡是由他和党中央发号召搞起来的群众运动，即使有些做得过火或出现了偏差甚至造成了破坏，也只能在前进中作局部性的调整，不能公开提出批判“极左”。其实自号召夺权而造成几近失控的局势后，毛自己就相继采取了“三支两军”、“大联合”、“三结合”和“一打三反”等等措施，实际上都是在调整，也即“纠偏”或“纠左”，只是公开决不会这样宣传。不仅文革中的是这样，此前的“大跃进”也是这样。这是因为运动中“左”与“右”总是紧张地对峙着的，你作为领导一提出要批“左”，等于承认发动这场运动是错误的，“右”的一方必然乘机而起以至压倒“左”，其结果便是整个运动的失败。当然向干部群众说明时不能用这样的语言，而是要说气可鼓而不可泄呀、要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呀等等。大跃进中提出要保卫三面红旗，文革中则是要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成果等等。

周恩来自然也是熟知个中三昧的，但他作为国家总理，在大量的实际工作接触中，深感干扰更直接、更多的还是运动中的那些“极左”做法和造反派“极左”行为。因而毛一提出要“批林整风”，就以为遇到了一个批判“极左”好时机。而张春桥，即使单从自己的地位和遭遇出发，也让他更容易理解毛的意图。在这场较量中，张就这样似乎又一次成了“赢家”。不管怎么说，毛一方面还离不开周恩来这位实干的大管家，另一方面却也对他积聚了更多的不满。

1972年十一月十一日，保健医生进一步确诊周恩来所患为膀胱癌，且还在发展，不得不正式向中央提出书面报告，建议要“注意休息，注意睡眠，采取减少工作和其他一些可行的办法”。毛泽东当即在报告上批示：“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周膀胱癌的进一步发展，和毛自己健康状况的不断恶化，对他这时正在进行中的中央高层人事布局构想，关系极为重大。

此前，毛已再次提出要落实干部政策，让一些老干部出来工作。对曾经作为“二月逆流”批判过的“大闹怀仁堂”一事，这时说：“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其时尚下放在江西的邓小平，当然也是一位精明强干而又善于审

时度势的政治家，他从上述种种政治信息中读出了两个字：机会。这年八月，他向毛写了一封要求做点工作的信。果然，毛很快作出批示，说对邓“应当与刘少奇加以区别”，那意思是可以考虑让邓出来工作。这样在周恩来的安排下，1973年三月初邓回到北京。几天后，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党组织生活和副总理职务的《决定》。

与此同时，毛建议提前召开党的“十大”。按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1969年四月召开的“九大”，到1973年初还不满四年。不过党章同时规定：“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前或延期举行。”

很显然，上述种种，都是毛为尽快解决“领导危机”的“特殊情况下”，作出的“特殊”安排。

正是在“十大”紧张筹备过程中的七月四日，毛对周主管的外交工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说“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更为不寻常的是，毛的这些话不是直接对周说的，而是打个弯，对张春桥和刚参加中央工作不久的王洪文说的。为筹备“十大”，张、王分别负责起草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这天晚上毛找张、王原是谈有关起草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的情况，但后来谈的实际主要就是批评外交工作，其中有几句话似乎还是直接针对周的，如说：“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由于周不在场，而按照惯例，毛如此重要的谈话又是必须向政治局传达的。谁来传达呢？那时王还只是中央委员，当然只能由作为政治局委员的张来传达。第二天即七月五日，周主持政治局会议，张传达毛的谈话，实际也即当着周的面批评了周。这不仅使周，也让张，十分尴尬。后来周在向毛上送外交部对错误的检查时，附了一信：“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毛批示说：“检讨不要写了。”总算网开一面。

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件耐人寻思的事，时间是五天后的七月十日。

这天晚上，毛在他的住处中南海游泳池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即将召开“十大”的相关事宜。此时由张起草的政治报告政治局已通过毛也审定，留下的一个问题是：由谁到大会去作这个报告？毛没有表态，只好留下再议。

如果联系一下中共党史惯例，在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的通常总是第二把手，那么这很可能是一道考试题：看你能不能摸准毛正在酝酿中的“十大”后中央领导层人事格局的心思？在随后召开的另一次由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提出了一个既无人反对也少有人附和的提议：“十大”政治报告由王洪文来作。张肯定反复思考后才这样提的，但这一回他错了。那时我借调在中央办公厅参加为筹备“十大”而成立的党章修改小组，要完成两个文件：一是党章修改草案；一是《关于修改党章的说明》。一个多月后（确切日子已记不得），毛在我们小组上送的《关于修改党章的说明》上大笔一挥，将标题中的“说明”改为“报告”，变成了规格大为提高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又亲笔署上报告人“王洪文”三个字。毛这一改，至少表达了这样两层含义：一、王洪文已被抬举到了大致等于“接班人”的地位；二、既然王已成为修改党章的报告人，不言而喻，周恩来也就成了政治报告报告人的唯一人选。我估计，张春桥会对自己这一错误的提议暗中深深自我检讨一番的。因为他的“冒失”，不仅又一次当面“得罪”了周，更为不该的，还在毛面前暴露出他在与对手较量中有失大度的品格。

随着大会进入选举的议程，毛又做出了一个堪称奥妙无穷的举动：让这一天主持全体会议的周恩来在会上宣布：“毛主席的票，由王洪文同志代投。”至此，毛选择王为“接班人”的意图已表达得十分明显。但因上过党章的“接班人”林彪“自我爆炸”的沉痛教训，参加大会的代表们都忌讳提到“接班人”三个字，这真叫“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七）张对周说：“你就做周公吧！”

王洪文一旦被定为“接班人”，那么在1949年以来那种独特的政治体制下，张与周无论他们各自的主观愿望如何，两人的关系立刻就会发生微妙的变化：究竟由谁担任第一“辅佐大臣”？说不定还会由此引发一场或明或暗的角逐“主辅”之争。尽管张在资历、声望、能力和经验等方面都无法与周相比，但周却不可能不想：人家可是从“安定事件”起就已经做了王洪文的“老头子”了呀！

就在这期间，会上发生了一场颇大的争论。那是在讨论主席团名单的政治局会议上，许世友带头竭力反对王洪文任主席团副主席。实际持反对观点的还不止许一人，党、政、军不少老干部都有类似想法。挺王最力的是两个人：周恩来和叶剑英。叶在政治局会议上引用三国时期孙权起用年轻的周瑜而程平等老将反对的历史典故，批评许思想落后于时代，没有看到党和国家的未来。周为了“打通思想”，特地召开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联系党史再三说明“我们一定要跟上主席思想，人总是要老的，趁现在赶快重视选拔年轻干部，决不能看不起‘儿童团’”。当他说“我们有些老同志怎么会糊涂到这个地步”时，噙着泪水，几次哽咽，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感动。

在这场争论中，与周、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张没有说多少话。多数场合，他只是转述周的话，或表示同意周的意见。我理解张的这种“低调”，表明他已经领会了毛的意图，自愿退出“主辅”之争。更能说明这一点的，我以为是让他让我写“十大”《新闻公报》这件事。按“九大”成例，公报该是张自己或姚文元写的，他让我写，肯定经过深思熟虑。我猜测，用意就在由我这个与中央领导层毫无人事瓜葛的小人物来起草这份必然要涉及到已经成为高度敏感的政治人物王洪文的公报，或许可以缓解张、周之间的矛盾，避免你意想不到的误解。有关这份公报的起草过程和张、周对此各具特色的处理，我与郑重兄交谈时有过较为详细的叙述，《大传》已录，此处不赘。

此外还有一件事，就是张又一次说了他的“野心”是“想写一部《毛泽东传》”的话。那是在“十大”闭幕那天傍晚。作为大会秘书长一直忙碌着的张春桥，端了个人民大会堂那种专供中央领导人开会进餐用的长方形景泰蓝漆盘，坐到靠窗的一张台子旁开始享受晚餐。这时记不得是谁跑来说有事要找一下总理，张对他说总理在某个房间，大概在同几位专家商量大会文件翻译的事吧。那人走后，张忽而深为感慨地说：“总理懂得多国文字，组织文件翻译这样的事，只有他能做。他的学识，他的经历、能力和为人，我这一辈子想学也永远学不到了，你不佩服也不行。”吃了口饭，喝了口汤，停了一会，略微提高了一下嗓音，像是自言自语、其实是当着大家说的：“有人说我张春桥想争这个，又想争那个，好像有什么野心。其实呢，要说有什么野心的话，我这一生最大的野心，就是想写一部《毛泽东传》。”

如果说，两年前张与我们一起讨论文章时说他有这个“野心”还只是抒发一下可能已蓄意多年的心愿的话，那么这一次明显有了别样的含义。我当时听了就觉得好像他是要向人们表白点什么，或者说是挂起了一块“免战牌”吧？若果如此，我以为张最希望听到他这番话的一个人，应该就是周恩来，“免战牌”也是向周挂的。

在这期间，张还就辅佐王的事与周有过一番对话，我没有直接听到，是多年后，张被软禁在江阴某处与陪伴他的家人偶尔说起，我才辗转听到的。张说：“那天我对总理说，周公辅成王，功劳都在周公，你就做周公吧。总理回答说：我总是在主席之前走的。”

大约也就在“十大”后的那几天里，毛批给周读一篇古文：《史记·汲郑列传》。这是两个月前毛通过姚文元，让上海市委写作组注释并用三号老宋印刷的，因称“大字本”。题中“汲郑”即汲黯、郑当时，都是西汉武帝时清廉、直言的名臣，郑当时更以善于荐贤举能著闻。周一看自然懂了，知道毛是希望他爱护、辅助王洪文，多推举年轻干部。他特地写信给毛，谈自己的读后体会，其中有两句是：“深有所感，愧未能及。”

从这时起，周凡是向毛上送请示或报告，均与王一起署名。一场“主辅”之争，至此似乎偃旗息鼓了，却不料两人的角逐又陡起波澜。

我因筹备“十大”借调在北京工作三个多月，深感自己缺少在中央高层应对各种复杂关系的能力，再说也不感兴趣，等大会闭幕留下的一些杂务全都做完后，就坚决要求仍回上海。我是这一年九月初回到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住进了我在“康办”大院（即市委书记处所在地康平路大院）的办公室兼寝室，便日以继夜地一面到基层去做调查收集材料，一面开始着手写“蓄谋”已久的反映文革的长篇小说。某天下午，一向宁静的大院忽而说笑声、掌声声热闹一片。偶尔从窗口往下望望（我住在三楼），更大为意外：与拥在周围的家属和孩子们说话的，竟是邓大姐——邓颖超！后来知道，“十大”闭幕不久的九月中旬，周恩来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到上海访问，其间，随同周前来的夫人邓颖超，出人意料地带着秘书来到了“康办”大院。邓大姐访问了住在大院的市委领导新老干部和已故柯庆施的家以后，这时正在发表她的告别讲话，末了几句似乎是有意大声说出的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她说：“今天我是特地来拜访大家的。该去拜访的，都拜访过了，只有一家没有去。不去的原因，你们大家一想就可以想到的。”邓没有去的一家，就是张春桥的家。这天张的妻子文静也是高高兴兴做了欢迎的准备，但她等了个空。邓说她不去的“原因”大家“一想就可以想到”，这也说得很对。因为除了孩子们，大院里不少人的确都知道，文静有个“历史问题”，那就是1943年在晋察冀边区一次对日寇的反扫荡战役中因受伤被俘曾有过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等变节行为。但叫人生疑的是：这个“历史问题”她不仅早已向党组织作过交待，组织上经过审查也作出了结论，1949年就已批准她重新入了党。按说这已是一个不成其为问题的“历史问题”了，更何况其时文静已赋闲在家，根本不会影响到上海市委工作，与中央高层更隔着十万八千里，邓颖超何以还要显然是经过细心安排的先来这么一番访问，再来一个公开宣布呢？所以如果大家不是“想一想”而是想了又想，那就很快会想到文静背后的张春桥：张本人不也是“叛徒”吗？尽管毛泽东已表态“不查”，但周恩来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还是不肯放过张。三天后文静病倒了，急送医院抢救。

我听到这个消息不由打了个寒噤。越发觉得像我这种脆弱的性格，根本不适合在中央工作，庆幸自己这回总算做出了坚决要求回上海的正确选择。但不久出现的事，却说明我已经没有了这种自由。

这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市委书记马天水突然找我谈话，说刚接到北京通知，让我第二天到中央办公厅报到，还说这回是正式调动，不是借调。这样，二十六日我就来到了当时王洪文所住的钓鱼台十六楼，王热情地接待了我。因此前我曾当过两三年上海市委书记和部分常委每天中午两小时读马列的辅导员，所以王一开头就说：“把你调来，就想请你继续做我的老师。这事我向主席和总理、春桥同志报告过，他们都同意。不过还是要听听你有什么意见？”我当然不敢再有任何意见，只是一再说明做老师不敢当，但我愿意尽自己努力做好工作。

也就在这次交谈中，王说到毛找他谈了一次话，谈对他的工作安排问题。当时我只是从如何做好辅导工作去理解的，但后来，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我在反复思考了整个文革十年历史以后，觉得毛这次谈话的含义决非只限于要王读马列这样一件具体事，而是在“十大”完成了中央高层人事布局后，又对这个布局作了整体思考后的结果。王洪文是这样说的——

前天，主席找我单独谈了一次话。主席说你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学习着重就是读马列，有些不好懂，可以找个老师，查查资料。读书是学习，工作也是学习。工作上你有两个老师，一个是总理，一个是春桥同志。

我个人理解，以为毛这番讲话除了明确选定周为“主辅”、张为“副辅”以外，还透露出这样一些重要的政治信息——

第一，说明毛已吸取了前后两次选择同辈而又是共事者刘、林为“接班人”的教训。此前，认为“共产党没有王位继承法，但也并非不如中国古代皇帝那样聪明”；此时则实际上不得不承认还是“中国古代皇帝聪明”，要向他们学习，也选一个小一辈的人做“接班人”。这一年毛已整八十，而王还只有三十八岁。

第二，像古代深居东宫的皇太子只是学习或偶尔见习朝政而不是实际管理朝政那样，毛明确规定王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读书是学习，工作也是学习。王自1972年九月上调“参加中央工作”到1976年十月被抓起来的四年多时间里，除按规定参加各种会议外，受命做过的实质性的工作有这样几项：一、先后或分别与许世友、纪登奎一起赴杭州，或由他一人单独前往，协助省委解决浙江问题。二、参加周恩来负责的中央小组，调查、处理南京、福州、济南三军区司令员庐山会议期间给林彪写信的问题，当时也称“解决华东问题”。三、自1974年六月一日至1975年七月一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实际上主要就是主持在这期间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并将会议情况向毛上报。四、分管的事只有一项：负责中央读书班。读书班具体由中组部主办，带有当时中央党校性质，参加者大多为各省市推荐的新干部，共办了三、四期。对“接班人”作如此安排，至少可以确保集权体制的完整统一，杜绝了出现另一个“司令部”的可能，当然更绝不会出现像林彪那样的“带枪的司令部”的危险。

第三，无论当时和现在，我都认为毛泽东选择王洪文为“接班人”决非轻率之举，而是经过慎重的观察和思考的。如果我们把自“苏州谈话”以来毛对中央高层人事布局前后两次构想的相关史实作一番梳理，就可以清楚看到，老人家是想竭力在他有生之年解决凡是通过暴力革命建立起来的政权都必须解决的“双重过渡”这个大难题，即如何尽快从武官政治过渡到文官政治，从重用功臣宿将过渡到启用新兴官僚群体——在毛的构想中则是以工农为主的干部群体。选择王为“接班人”，同时参加“十大”的代表百分之六十七为工农兵，选出的中委和候补中委体现了“老中青”三结合，都是他这种努力的重要标志。此外，这样做还有体现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含义，更何况让工人、农民直接来管理国家，这符合马克思、列宁的设想，又正是毛本人向共产主义过渡中的一种理想。如能顺利实现，在国际共运中那倒的确算得上是一项创举。

但后来的事实却证明，这只是毛泽东也包括我们这些积极投入文革的人的一厢情愿。

古代帝王实行世袭制，继位的新皇帝即使还是孩子，有的还在襁褓中，甚或竟是个白痴，按照世系承续的皇统，臣民们照样会三跪九叩，山呼万岁。1949年来中国实施的政

治体制与古代帝王制度还是有着不少区别，废除了世袭，排除了在所谓“奉天承运”光照下的血缘关系对政治的介入，便是这种区别之一。毛泽东对王洪文上述种种细心的安排固然可以确保不会出现像刘少奇、林彪那样的“司令部”甚至“带枪的司令部”，但真叫作“扶得东来西又歪”，如此安排又带来了一个新矛盾，而且是很大的矛盾：如果王洪文一直没有掌握实权独当一面地工作，没有相应的资历、能力和执政经验，单凭“种过地、当过兵、做过工”这点“资本”，即使勉强接了班，又怎么能获得大多数人、特别是依旧健在的大批功臣宿将的承认呢？不仅是王洪文，不少结合到权力机构的新干部也即造反派也大多是这样。

“十大”中委和候补中委确实可说实行了“老、中、青”三结合，但“青”包括不少“中”他们所担任的大多是“虚职”，很少有掌握实权的。“九·一三事件”后随着林彪“司令部”的垮台，又有过一次权力再分配，从这时起，毛泽东当然依旧稳稳地掌握着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但实际具体地在各部门、各省市掌权的极大多数是功臣派或称老干部，后来统一尊称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种格局下，毛泽东的让工人、农民直接来管理国家的是理想，永远只能是理想。

（未完待续）

□ 原载郑重：《张春桥：1949及其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7月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